

琦君“故家故事”的道德焦虑与伦理选择：以《髻》与《橘子红了》为例

Moral Anxiety and Ethical Choices in Qi Jun's Family Stor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gnon* and *The Orange Turns Red*

陈力君 (Chen Lijun)

内容摘要：琦君的小说《髻》和《橘子红了》体现了传统家庭的伦理秩序和伦理观念，以及在静止而封闭的家庭环境中的道德焦虑与伦理困境。叙述者“我”一方面怀恋镌刻着时代印记的已逝家园，另一方面又以现代理性意识洞察其间的矛盾和危机。随着情节的发展和叙事者的“成长”，质疑和反思的叙述声音越来越大，叙述层面的伦理冲突越来越明显。琦君的身世加大了她在作品中伦理选择的困难。首先，作者认识中的伦理选择完全符合传统家庭的道德规范；其次，身份意识产生的道德压力在作品中转化为个人伦理选择的动力；最后，叙述者对应的“女儿”和“侄女”的复杂角色，隐含着对身份问题的伦理思考。道德焦虑和试图摆脱焦虑的渴望成为琦君书写“故家故事”的情感基础和创作动力。

关键词：《橘子红了》；《髻》；琦君；故家故事；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陈力君，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影视文化研究。

Title: Moral Anxiety and Ethical Choices in Qi Jun's Family Stor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gnon* and *The Orange Turns Red*

Abstract: Qi Jun's novels, *The Chignon* and *The Orange Turns Red*, illustrate the ethical order and concepts of traditional family life and the moral anxiety and ethical dilemmas that arise within static and enclosed family environments. The narrator, "I" deeply cherishes the bygone family home with its imprints of the era. However, with a modern r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narrator also perceive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rises within. The voice of questioning and reflection becomes more prominent, and the ethical conflicts at the narrative level be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Qi Jun's background further complicates the ethical choices depicted in her works. Firstly, the author's ethical choices, under her awareness, align perfectly

with the moral norms of traditional families. Secondly, her sense of identity generates moral pressure, leading to sharp contradi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ethical choices and societal ethical standards. Thirdly, the roles of “daughter” and “niece” that the narrator corresponds to imply deeper ethical dilemmas under the sense of identity. Moral anxiety and the yearning to break free from it become the emotional foundation and creative driving force of Qi Jun’s family stories.

Keywords: *The Orange Turns Red*; *The Chignon*; family stories; moral anxiety; ethical choice

Author: **Chen Liju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Specializing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Culture (Email: chenlijun2@zju.edu.cn).

琦君（原名潘希真）作为大陆迁居台湾的乡愁文学的代表作家，创作了30多部散文集、7部小说集，以及若干儿童文学作品，海内外影响深广。1969年的《髻》和1987年的《橘子红了》以怀旧感人的文学主题，揭示了故家故去的深层原因。时代冲击固然造成家庭动荡，但最让人痛心的是家庭内部矛盾冲突造成的情感撕裂。两部作品表现出的道德焦虑，扩展了琦君“故家故事”的思想深度。

一、故事：传统家庭的伦理困境

《髻》和《橘子红了》都是书写故家伦理困境的小说。《髻》讲述了“男尊女卑”的旧家庭中的惨痛家事：“父亲”娶“姨娘”后，“母亲”每天通过梳理不同发式表达心中不满，与“姨娘”竞争。“母亲”向“姨娘”示威和挑战表达的既是“母亲”的隐痛和辛酸，也是“我”的童年创伤。《橘子红了》讲述了旧家庭中因妻妾争宠而酿成的人间悲剧，延续和深化了《髻》的主题。长期滞留乡下的“大太太”为讨好丈夫、稳固家庭地位，以繁衍子息为借口，把乡下女孩秀芬娶为丈夫的三房。但她的行为并未改变自己的境遇，反而导致秀芬的人生悲剧。两部作品通过旧式婚姻制度造成的家庭悲剧，反映中国传统家庭的伦理困境，展开现代性反思。

“文学作品中的伦理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90）¹。《髻》和《橘子红了》中让人痛心的“故家故事”体现的是传统家庭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决定个体处境，人物身份决定伦理选择，不同的伦理选择形成不同的情感态度和行为方式。所有的个人行为 and 动机、人与人之间的

1 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关系和社会矛盾，都是伦理选择的结果。两部小说通过主人公的人生悲剧，展现了近现代中国江南文化区的伦理观念，以及因伦理观念变化而导致的情感焦虑和伦理困惑。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现代文明的思想观念逐渐扩展，但传统观念仍根深蒂固，家庭环境依旧封闭守旧。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家庭成员的言行举止都遵循传统伦理观念，“男尊女卑”是传统夫妻关系的基本特征。上层社会的富裕家庭大多沿用妻妾制的婚姻制度。在这种婚姻传统中，形成了与妻妾制相对应的伦理秩序：女性在家庭中地位低下，在身份上从属于丈夫，处于被支配的家庭地位。在妻妾制的家庭中，女性生存竞争和权力倾轧现象普遍。

琦君通过传统家庭日常生活描述，展现了传统家庭的伦理秩序，揭示了家庭成员因伦理身份的变化而造成的沉重道德负累。《髻》和《橘子红了》中的家庭成员相互间的对立和矛盾，都是根据各自伦理身份进行选择的结果。在两部小说中，代表传统道德又受困于传统道德的人物“大太太”成为传统伦理秩序的牺牲品。“大太太”是传统家庭的道德典范，她在家中日夜操劳，埋头于家务，谨遵妇德，绝对服从丈夫意志，但她的付出往往被忽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橘子红了》中的“大太太”愁的是在外做官的丈夫长久没寄信回家，即便寄来了，也“只有三言两语，回回都是那几个文言文字眼”，但她总是“双手捧着一遍又一遍的看，嘴角笑咪咪的”（琦君，《橘子红了》17）。不识字的“大太太”仅得到丈夫简单的家信就感到满足，这隐含着她卑微的心态，也体现了旧式婚姻中夫妻的不平等地位和情感不对等。同样，《髻》中的“母亲”也经历了类似的人生境遇。作为传统家庭中的主妇，她们不仅完全接受传统家庭道德规范，还以道德规范为人生圭臬。她们极力掩饰对丈夫的想念和克制情感的曲折心理，是大家庭中“大太太”身份长期被约束和压抑的结果。

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冲击，传统的家庭模式就会保留下来，家庭中偶而出现的矛盾或意见分歧也会被忽略。在《髻》和《橘子红了》中，作者设置了导致婚姻关系变化的关键人物“姨太太”。“姨太太”的到来带来家庭环境变化，导致家庭成员矛盾。《髻》中的“姨娘”一出现就抢了“母亲”的风头，构成了与“母亲”间的竞争关系。作品中叙述了“我”感受到的两人间的令人窒息的较量：“母亲”引以为傲的头发，陡然失色；“姨娘”“一头如云的柔发比母亲的还要乌，还要亮”（琦君，《髻》34）。面对年轻的竞争对手，“母亲”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感。尽管如此，“母亲”还是选择与其身份匹配的发式，这注定了她在争宠中落败。同样，《橘子红了》中的“大太太”也面临“姨太太”的竞争威胁。

伦理关系决定身份意识，只有身份的改变才会带来变动和选择。¹《髻》

1 关于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的关系，参见 查尔斯·罗斯、杨革新：“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聂珍钊访谈录”，《外语与外语教学》4（2015）：75-78。

中的“母亲”和《橘子红了》中的“大太太”，她们的伦理身份决定了只能选择与身份相符的行为，即使在激烈的竞争中也不会变通。在《髻》中，“母亲”心里清楚古板的发式让丈夫讨厌和嫌弃，但其身份决定了她只能选择保守的旧式发髻。同样，《橘子红了》中的“大太太”完全根据其身份进行选择，不仅不敢要求丈夫回家，还表现出识大体的样子，安排丈夫迎娶三房。而面对二房“姨太太”的挑衅，她同样选择委曲求全、不公开对抗。琦君两部小说中“大太太”的复杂心理以及克制与隐忍，都是她们按照其身份进行选择的结果。

在旧家庭中，与“大太太”争宠的“姨太太”也加入身份选择的竞争中。《髻》和《橘子红了》中的“姨太太”，凭借年轻貌美暂时获得丈夫的宠爱，但随着时间流逝、美貌消失，她们也会像“大太太”一样，愈来愈受困于传统家庭的伦理秩序，无法避免遭遇其他家庭成员的抵触和排挤。旧时代婚姻关系决定了女性的人生处境，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女性间的竞争，注定只能是一种争宠和自我消耗。在旧家庭这一伦理环境中，女性间的争宠是她们不得不做出的伦理选择，但弱者间的争斗又进一步强化了她们的身份意识。不论她们如何竞争都只能屈服于夫权，不能改变她们被动和屈从的地位。

中国传统社会家庭制度历史悠久，形成了一套严格的道德规范，不仅女性按照身份进行选择，男性同样按照身份进行选择。《髻》中的“父亲”被“母亲”崇拜，在“母亲”面前拥有绝对权威。即便如此，“父亲”也只能在家庭伦理秩序中按照身份进行活动，无法自由地做出选择。面对妻妾间的矛盾冲突，“父亲”既不参与也不评判，而是选择无视。同样，《橘子红了》中的“丈夫”在家庭中拥有无上权力，但也不能进行自由选择。面对妻妾们的明争暗斗，他同样选择置身事外。家庭关系中具有绝对权威的丈夫对待妻妾的态度表明：传统家庭伦理观念下的男性容易丧失鲜活的生命力，成为空洞能指的象征符号。男性在现实家庭关系中的缺位，加深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秩序中女性的不幸。

《髻》和《橘子红了》对旧家庭中人物的伦理选择的书写，呈现了中国传统家庭的伦理困境：稳固、静止和封闭的旧家庭受家庭权力结构的限制，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伦理观念成为主导，决定着家庭成员的人生选择。在传统家庭的伦理秩序中，家庭成员都有强烈的身份意识，只能按照传统的道德观念进行选择。

二、叙事：新旧伦理冲突

小说作为叙事艺术，叙事策略的运用体现了作者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观念。¹“文学伦理批评主要是为了解读文学文本，将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视为

¹ 有关小说叙事策略与主体意识、文化观念的关系，参见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60-261页。

人类道德的记录，以各种方式将伦理结串在一起的伦理排列结构或伦理线，构成了文学文本的主要伦理结构”（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91）。在《髻》和《橘子红了》这两部作品中，旧的伦理观念认可传统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遵循传统伦理秩序和传统道德规范；新的伦理观念接受西方现代价值观念，强调个体价值和精神自由，包含对旧的伦理观念的反思。新旧伦理观念的冲突通过作品叙述声音的变化得以体现。这两部作品设置了经历成长过程的叙述者“我”，而“我”的认知随着不同的人生阶段发生变化。儿时的“我”接受的旧伦理观念与长大后接受的新伦理观念发生冲突，叙述者“我”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伦理倾向，构成了作品的叙述逻辑。

两部小说通过“我”叙述孩童时期的人生经验，体现出强烈的维护旧伦理观念、称颂传统道德规范的情感立场。叙述者“我”在作品中表现出偏向母亲和大妈的情感倾向。如《髻》中年幼的“我”面对“母亲”和“姨娘”的竞争，选择站在“母亲”一边，为“母亲”抱屈；而《橘子红了》中的“我”坚决站在“大妈”一边，在听说“大伯”娶了二房“姨太太”之后，感到“心都发抖”（琦君，《橘子红了》16）。“我”伦理立场的形成是身份意识的深层作用和家庭长期教导的结果。“我”选择与“守家”的“大妈”保持一致，符合基本人性和情感逻辑。与此叙述立场一致，“我”难以避免主观情感的影响，也会据此对人物进行道德评判。因此，作品中的“姨太太”被塑造成有违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形象。如《髻》中与忙碌家事的“母亲”不同，“姨太太”只顾打扮，追求安乐享受。“我”虽然深知敬爱的长辈的自私和冷漠造成了秀芬的悲惨结局，却不愿直接指摘长辈，认为秀芬“是被摆布着进入一个陌生的家，却意外地享受到家的温暖的”（琦君，《橘子红了》35）。这一叙述的转折，既表露了“我”同情秀芬，不愿直陈其不幸和痛苦人生的曲折心理，又通过偏向于秀芬的安慰表述，缓解了“我”作为家庭成员的道德压力，避开了直接指责长辈、批判旧家庭的情感困境。

接受现代思想的成年后的“我”的思考则体现了新的伦理观念。如《橘子红了》中的“我”面对秀芬不幸死亡时，不再局限于孩童经验，超越了“我”的情感立场，以反思旧家庭无视底层女性生命和尊严的落后观念，质疑传统伦理观念：“究竟是谁的罪过呢？是大妈吗？是大伯吗？还是那个交际花姨太太呢？无论如何，秀芬是没有一丝罪过的，但是秀芬却承担了一切”（琦君，《橘子红了》96）。“我”长大后，回想发生在旧家庭中的不幸和悲剧，不禁反诘长辈的观念和行为，为承受屈辱和不幸的女性鸣不平，体现了“我”的现代意识的觉醒。“我”甚至直至指出其过错：“大伯真的会把秀芬放在心上，说自己‘至为哀痛’，但‘待我归来’，究竟是哪一天呢？难道让秀芬死后还要无年无月的等待吗？”（琦君，《橘子红了》103）

“我”以充满激愤的口吻和理性态度质疑家庭权威、传统伦理观念，谴责其冷漠和敷衍的态度才是导致秀芬不幸和悲剧的根源。与之相类似，《髻》中的“我”长大后也开始反思传统家庭的伦理观念，在“母亲”和“姨娘”过世后，逐渐洞悉了人情、人性，能够客观地理解“母亲”和“姨娘”之间的较量和仇视，这赋予作品更多历史内涵和文化厚度。

孩童时期和成年后的“我”的伦理意识的变化，不仅使叙述倾向的新旧伦理冲突日益激烈，还造成作品中的叙事立场的矛盾和犹疑。但作为旧家庭抚育成长的“我”，最终也难以舍弃维护家庭的情感立场，努力挖掘传统家庭伦理秩序下的善和美。“叙述者评论的内容，是已经经过叙述加工的内容。叙述者加工与叙述者评论，同样是道德行为”（赵毅衡 55）。作品中的叙述者围绕传统道德规范确立伦理定位，淡化旧式家庭对立和危机，营造故家的温馨氛围和美好印象。琦君坦言，虽然觉得“大半生中所遭遇的许多事，许多人物，并不个个都像我回忆童年文中的人物那么纯朴善良”（琦君，《与我同车》210），“可是我觉得，社会上坏事情已经很多了，所以为什么不把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呢（……）写好的写惯了，一写，心里想到的都是温馨的”（廖玉惠39）。琦君意识到，她无法化解其内心的伦理冲突，在作品中选择了倾向于传统伦理的叙述立场。这一叙述立场表明她不能超脱刻骨的故家思念和眷恋，只能选择正视故家所处的历史语境，探寻故家伦理秩序具有合理性的叙述逻辑。在她看来，故家的传统伦理观念以及所体现出的新旧伦理冲突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

《髻》和《橘子红了》隐含着叙述伦理的内在冲突。叙述者“我”面对“故家故事”体现出激烈的伦理冲突：情感维度的旧伦理观念与理智层面的新伦理观念产生激烈碰撞。一方面，“我”深深怀恋已经逝去的故家，那是镌刻着时代印记的家园；另一方面，又以现代思想和理性意识洞察其间的矛盾和危机。

三、本事：作者伦理选择的两难

《髻》和《橘子红了》的伦理观念和伦理冲突不仅表现在故事和叙事层面，同时也因作者身世而愈加复杂。勒文森在阐释中国近现代文化嬗变时，发现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知识分子存在“历史与价值的张力”（勒文森 3-4）的普遍心态。琦君通过书写“故家故事”体现其个体经验、社会道德压力及其复杂身世。

首先，在《髻》和《橘子红了》两部作品中，传统家庭的道德规范带来的伦理选择体现了作者的身份意识。《髻》中的“我”是女儿身份，当她以女儿身份目睹“母亲”和“姨太太”内闱争斗时，“我”选择与“母亲”一致的情感立场，认同“母亲”的情感，较少反思；《橘子红了》中的“我”是收养的侄女身份。相较于《髻》中的“我”，《橘子红了》中的“我”面

对家长表现出客观和理性的情感立场。“我”不会一味偏袒“大妈”，会对其不合理的行为提出异议，对其无条件服从丈夫的行为表示不满。两部关于“故家故事”的小说分别以“女儿”和“侄女”的不同叙述视角表达不同伦理情感。

不管是“女儿”还是“侄女”，琦君深受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对哺育和培养她的旧家庭充满感激。在《髻》和《橘子红了》中，作者历数了在旧家庭中受到的呵护和关爱，这也决定了作者的身份意识。《髻》中的“我”，对“父亲”的想念溢于言表，通过语言和细节体现了父女间深厚情感。这份亲情在《橘子红了》中也得以充分表达。而在现实中，琦君的伯父伯母（养父母）不仅在其丧失双亲的幼年时期收养她，还视同己出地抚育她长大成人。在教育培养上，琦君的大伯表现出的现代教育理念和超前意识¹，使琦君终身受益。琦君以亲身经历展示了在充满关爱的家庭中长大、对伯父伯母有着深厚感情的故家情结。

琦君有着明确的身份意识，她不仅在作品中不断流露对旧家庭的感恩之情，也在作品中称颂传统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伦理秩序。即使意识到传统伦理观念下的家庭会不断产生矛盾，甚至危机，她还是表现出强烈的传统伦理意识：渴望家庭的完整和美满、认同传统家庭观念、为传统伦理观念辩护。

《髻》中的“我”长大后离家求学，一直无改对“母亲”的爱和依恋；而《橘子红了》中“我”听说“大伯”在外面娶了“二太太”，立即生出“大伯怎么可以这样对待糟糠之妻？这是欺骗，这是不忠实”（琦君，《橘子红了》16）的气愤情绪，但又不忍心责备大伯，认为“大伯是为了子息，等生了一男半女以后，再告诉大妈，她是贤德女人，没有不肯的”（琦君，《橘子红了》16）。在《髻》和《橘子红了》中以男性家长为尊的家庭伦理秩序，充分体现了琦君强烈的传统家庭观念。面对家中长辈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尤其当作为家庭权威的“大伯”伤害其他家庭成员时，作为晚辈的“我”只能委婉地为“大伯”的行为辩护，这体现出琦君维护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努力。

其次，琦君在《髻》和《橘子红了》中的身份意识，也体现了琦君个人伦理选择和社会伦理观念之间的矛盾。琦君虽然在旧家庭中成长，却接受了现代教育，接触到平等自由等现代思想。但琦君深刻意识到：传统伦理观念依然强大，女性在旧家庭中处于不平等地位仍是普遍现象。琦君理解特定历史时期的伦理环境和道德要求，同情旧家庭中受苦和挣扎的人。虽然琦君个人受到旧家庭的厚待，但她无法忽视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她立足于现代性质疑她所思念的故家故人，不得不承受强大的道德压力。这种两难的伦理选择使琦君深陷困惑。她在极力赞颂传统家庭伦理典范的母亲形象、肯定女性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的同时，又同情女性在家中的不

1 参见琦君：《桂花雨》，中国台北：尔雅出版社，1976年，第8-11页。

平等地位。琦君面对故家的无奈情感、酸楚情绪和困惑心态，削弱了理性反思的力度。琦君的情理分裂正是其身份意识下不同伦理选择导致的困境。

最后，琦君在《髻》和《橘子红了》中书写的伦理困境，不仅是普遍意义上的作者身份意识造成的，更是她复杂身世带来的深度牵绊。伯父伯母兼养父母的双重身份，以及领养抚育这一极具道德高度的行为，令琦君在反思旧家庭传统伦理观念时，须承担抚养恩情带来的沉重情感压力。但是当作品中的故家形象日渐丰富，但现实故家却不复存在时，琦君痛感不能回报养育之恩。对故家的渴念使逝去的故家形象在琦君内心幻化成童年的伊甸园。但作为作家，她又在理性上意识到：不能只凭着对故家的怀念和依恋，塑造完美的故家形象，而无视旧家庭伦理观念带来的伤害和痛苦。创作行为使她深陷于伦理悖论。特别是面对旧家庭中不容质疑的权威者“父亲”和“大伯父”时，琦君的情感和理智背离分裂就更明显了。作为养女身份和作为作家身份的琦君，在作品创作时产生了情感对立。深受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影响的琦君的内心深处难以回避这一伦理冲突，难以弥合感情认同和价值判断。也正因为深陷于深情和困惑形成的缠结情绪，琦君才写出如此绵长伤痛又无限隽永的“故家故事”。这不仅是琦君的伦理困境，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转型和文化嬗递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的普遍伦理困境。

“在文学作品中，狮身人面像因素的概念体现在人物的自然意志、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的结合上（……）文学的功能是通过赞扬美德和惩罚罪恶来教导道德价值观，它的最终目的是回答如何将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置于理性意志的控制之下的问题”（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392）。《髻》和《橘子红了》通过文本内部、文本和世界、作家和读者等诸多关系，展示了伦理观念于作家的影响和作品的深层作用。无论是人物，还是叙述者，抑或作者，他们的伦理意识和伦理选择，都在探讨中国近现代历史转型期的伦理观念。琦君的“故家故事”从不同层面揭示出：作者的伦理身份形成伦理观念，伦理观念也反过来强化伦理身份，形成作品的伦理定位；伦理身份的改变带来了态度的改变，产生新的伦理实践。琦君的“故家故事”在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多重伦理关系中进行选择和定位，并将其人生经验转化为创作素材，而道德焦虑成为琦君书写“故家故事”的创作动力。

Works Cited

约瑟夫·阿·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刘丽、姜铁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Levenson, Joseph R.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translated by Liu Wei, Liu Li and Jiang Tiejun.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6.]

廖玉惠：“在彩色与黑白的网点之间”，《自由时报》2001年11月9-10日，第39版。

[Liao Yuhui. "Between Color and Black and White Dots." *The Liberty Times* 9-10 November 2001, late ed.: C39.]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琦君: 《永是有情人》。中国台北: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8年。

[Qi Jun. *Being a Lover Forever*. Taipei (China): Chiu Ko Publishing Co., Ltd, 1998.]

——: “髻”, 《红纱灯》。中国台北: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69年, 第33-38页。

[—, "The Chignon," *Red Gauze Lamp*. Taipei (China): Sanmin Book Co., Ltd, 1969. 33-38.]

——: “橘子红了”, 《橘子红了》。中国台北: 洪范书店, 1991年, 第11-108页。

[—, "Orange is Red," *Orange is Red*. Taipei (China): Hongfan Bookstore Co., Ltd, 1991. 11-108.]

——: 《与我同车》。中国台北: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9年。

[—, *Take a Car With Me*. Taipei (China): Chiu Ko Publishing Co., Ltd, 1979.]

赵毅衡: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比较叙述学导论》。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年。

[Zhao Yiheng. *When the Teller is Told About*.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3.]